

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

□ 孔祥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居安思危”出自《尚书》。“《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春秋时期晋国为达到与楚国争霸天下的政治目的，晋悼公听取大夫魏绛联合其他诸侯国对抗楚国的建议，八年九次召集各诸侯会盟，一时间称霸诸侯。郑国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晋国联合其他诸侯国讨伐郑国，郑国归顺且送给晋国大批礼物。悼公将礼物分赠给魏绛，魏绛引用《尚书》的话规劝悼公，提醒悼公要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注意做好防备，做到有备无患。

“未雨绸缪”出自《诗经·邶风·鸛鸣》：“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讲的是一只孤弱无助的母鸟遇到幼鸟被掠去的祸患与伤痛，鼓起勇气、振奋精神，趁天未下雨就赶快修缮窝巢，以应对将来的暴风雨。

这两则故事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蕴含着治国理政的丰富哲理与政治智慧：国家安定，要居安思危；面对困难和风险的挑战，要未雨绸缪，做到防患于未然。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精神特质。它产生于殷周之际，发展于春秋战国，秦汉以来不断丰富并应用于政治实践。《周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

羑里而作《周易》，说明处在殷衰周兴之际的周文王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儒、道、墨等学派的思想家对时政都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如孔子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子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墨子的“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等等。秦汉以来，针对国家兴衰、社会治乱、民心向背等重要政治问题，西汉董仲舒将“思患而豫防”作为治国爱民的首要条件，陈寿强调“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唐代魏征认为“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北宋欧阳修主张“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清代魏源指出“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等等。这种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不断发展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基因，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淬炼出的生存智慧，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思想法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曾遇到无数的困难与挑战，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忧患和担当意识。他们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开创出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如唐太宗常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忧患意识，不断革除弊政，开创了“贞观之治”。又如，范仲淹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表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忧国忧民意识，发起了“庆历新政”。中华民族正是凭借浓厚的忧患意识，才一次次应对了艰难险阻、渡过了激流险滩，历经沧桑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责任，更是担当。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面对人民、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困境和危难，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如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呐喊，教育弟子“当仁不让于师”，追求“杀身以成仁”的人生境界。再如，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认为天下士人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做到“舍生取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人生境界与价值追求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塑造了像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历史人物的强烈责任感与勇于担当的精神。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理性自觉，更是超前防备。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中庸》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里“豫”即预测、预备、预防之意，是对事情发展的预判与理性自觉，更是对危机或风险的预防与超前防备。古人云：“愚者暗于成事，智

者见于未萌。”有智慧的人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中，始终保持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做到备豫不虞。如欧阳修通过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盛衰的转变论述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治国道理，提醒为政者要有安危存亡的理性自觉，不要骄傲自满。又如，清代诗人黄景仁早在乾隆三十八年，就用“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诗句描写了“康乾盛世”下的潜在危机。遗憾的是大清帝国没有觉醒，结果陷入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祸患和灾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创造性提出“坚持底线思维”“三个务必”。党的十九大上，他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只有坚持从战略上做到居安思危、勇于担当，从战术上做到未雨绸缪、超前防备，发扬伟大斗争精神，切实把握历史主动，才能积极有效应对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挑战，进而谱写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陈旉农书》中的粮食安全观

□ 宋 玲 王慧萍

陈旉，生于北宋后期熙宁九年（1076年）。作为隐居躬耕的全真派道人，陈旉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多年参加农业活动，于74岁高龄时写成《陈旉农书》。农书篇幅较小，连序跋一共约12500字，但在我国古代农学上表现出不少新的发展。作为我国现存最早记载江南地区农业情况的著述，《陈旉农书》对当时南方地区农事活动的开展给予指导，不仅回应了两宋时期农耕文明由北方南移的社会所需，而且对宋代以后农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成为了如《便民图纂》等诸多农书的理论来源。《陈旉农书》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被多次刊印流传于世，明代收入《永乐大典》，清代收入多种丛书，18世纪传入日本。农史学家万国鼎评价其可以和《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王桢农书》《农政全书》并列为我国第一流古农书。

农书成书于粮食危机深重的两宋之交。社会状况方面，北方战乱不止，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大量人口南迁导致了南方地区包括食物在内的物质资料的消费和需求量的急剧增长。自然环境方面，水灾、旱灾、雨雹、连阴雨等自然灾害频发，危害农业生产。据历史学家郑拓在《中国救荒史》中统计：“两宋前后四百八十七年，遭受各种灾害，总计八百七十四次。”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严峻的气候条件相互交织，极易滋生粮食危机，维护粮食安全是现实之需。《陈旉农书》顺应时代潮流，书中蕴含着丰富的粮食安全思想，不仅为当时的粮食生产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更是“有补于来世”，为后世维护粮食安全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未雨绸缪——合理规划防范粮食危机

《陈旉农书》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在农业领域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的忧患意识，主张通过合理规划防范粮食危机。陈旉指出“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农事尤宜念虑者也”，点明从事农业生产，在耕种开始前就要预先考虑周全，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

尽量将粮食安全隐患扼杀于萌芽状态。

首先要因时制宜，通过巧妙利用天时规划作物的种植，避免“四序乱而不能生成万物”的不良后果。陈旉指出“农事以先知备豫为善”，认为要想获得农业丰收，就要“盗天地之时利”，认识阴阳消长的天时道理，按照自然规律合理规划农事活动。

其次要因地制宜，通过合理配置山地坡田与缓冲湿地等，构建蓄水防塘，预留蓄洪缓冲洼地，防治洪涝灾害。陈旉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复杂地理环境影响下土地规划问题的农学家，他依据土地的特点，提出了高地、下地、坡地、葑田、湖田五种土地规划方式。主张在山顶建造坡塘，在下地构筑圩田，在水面打造葑田，在坡地种植旱地作物，在湖泊边缘培育生长期短的作物，从而解决干旱、水患、水土流失等具体问题。

最后要因人制宜，通过精确评估民财和民力，理性规划农业经营规模，确保农业生产进入良性轨道。陈旉反对“财不赡，力不给，而贪多务得”的广种薄收的经营方式，认同“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这一谚语。认为农民治田，不在于田亩之多，而在于与财力相称，只有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与财力和劳力相匹配，在财力充裕的条件下进行深耕易耨，才能“岁岁常稔，不致务广而俱失”，确保粮食安全。

精耕细作——精进技术加强粮食生产

通过精耕细作促进粮食生产的主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萌发，例如春秋时期出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耑作法，战国初年李悝曾提出“尽地力之教”的观点等。《陈旉农书》继续和发展了这一农学传统，主张从耕地、肥料、农具等多个方面精细计算、细致耕作，通过纯熟的农业生产技术加强粮食生产。

多种经营并用，提高复种指数。复种是指在同一耕地上一年种收一茬以上作物的种植方式，是中国传统精耕细作、集约栽培的重要内容之一。《陈旉农书》提倡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和发展多熟种植来提升粮食产量。农

书中的农家经营虽以水稻耕作为中心，但也鼓励栽培粟、麦、豆、麻油、蔬菜等多种农作物。认为根据生长期的不同安排好作物的种植顺序，则能够“种无虚日，收无虚月”，增加农民的收入，使其衣食无忧。这种“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粮食安全观是当时举国上下的共识，与政府的相关诏令以及部分地方官员的劝农书是一脉相承的。

提倡粪治养地，保持土壤肥力。粪治即通过施肥的方式治理土地。陈旉把中医的理论和方法推广到农业生产当中，提出“粪药说”，对中国古代施肥技术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用粪如同用药，讲究“对症下药”。土壤的情况不一样，所用肥料的种类以及施肥的方式也不一样，需“别土之等差而用粪治”。《陈旉农书》除了“粪田之宜”篇专篇讨论肥料外，其他篇章也不乏关于肥料具体而细致的叙述。其中制造火肥、粪屋积肥、粪池积肥的理论在之前的古农书中皆无记载，是其在肥源方面的新发展，多次追肥的施肥观念更是弥补了以前农书只重视基肥和种肥，很少提到追肥的理论缺陷。

除此之外，农书还涉及了精细的土地耕种技术、独到的水稻田间管理技术、系统的南方地区水产饲养技术、详细的病虫害防治技术等。这些技术大多是依据陈旉多年躬耕的心得经验所得，并非“腾口空言，夸张盗名”，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有备无患——节用蓄藏充实粮食储备

《陈旉农书》主张统治者须带头节俭，并由上至下督促百姓蓄藏备荒，在全社会营造节用蓄藏的良好氛围。该书开设《节用之宜》专章，讲述节用观，节用与蓄藏相辅相成，充实粮食储备以防灾、备荒，是陈旉对粮食安全理论的一大贡献。

传统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大，足够的粮食储备是应对天灾的必要基础。《陈旉农书》强调粮食储备的重要性，从国家层面来看，“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粮食存储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从家庭层

面看，“今岁计常用，与夫备仓卒非常之用，每每计置，万一非常之事出于意外，亦素有其备，不致侵过常用，以至匮乏”，粮食消费要有计划，在日常用度之外还须做好蓄藏以备不时之需。

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必须节俭防奢。只有做到居安思危，收敛蓄藏，才能有备无患，达到“天不能使之贫”“天不能使之病”的治理目标。《陈旉农书》对不虑久远的农者“一年丰稔，沛然自足，弃本逐末，侈费安用，以快一日之适”的短视行为提出了批评，指出不能在丰年做到节俭防奢，则往往会在凶年面临“衣食不给，日用既乏”的困境。当然，陈旉的节用思想并不是要一味省吃俭用，降低生活质量，而是提倡适度消费。他主张“以礼制事，而用之适中。俾者不至过奢，俭不至过陋”，强调节俭也要适度。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在食不饱、穿不暖的艰难生活中，老百姓很难做到“守常心而不取非义”，各种为了生计铤而走险的事件最终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作为山居农书中最有成就的所在，《陈旉农书》颇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气质。陈旉虽隐居西山，其所做躬耕之事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他的农业理论实则是为了让民众维持常产，进而达到“民由常道”的终极治理目标。农书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到宋代达到了新的水平，研究中国农业史的著名日本专家评价它是宋代农书中值得大书特书的著作。它第一次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第一次用专篇来系统讨论土地利用、在中国农业史上第一次记载了桑树嫁接技术……在诸多创新和贡献中，合理规划防范粮食危机、精进技术加强粮食生产、节用蓄藏充实粮食储备的忧患意识和粮食安全观念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南水乡常熟有个古里村，依山傍水，到处都是密密的桑树林和竹园。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瞿氏铁琴铜剑楼就矗立在一片绿荫翠竹之中。传说，唐代有一铁琴遗物，在高山上抚此琴，可以声闻三十里。另有一把年代更为久远的铜剑。铁琴和铜剑聚首在一座缭绕着书香的小楼中，并在此后几百年，不断发出动人心魄的琴音和穿越时空的剑气。瞿镛作诗：“吾庐爱，藏弄一楼书。玉轴牙签频自检，铁琴铜剑亦兼储，大好似仙居。”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

在古代中国，私家藏书浸润着浓厚的文化情怀。铁琴铜剑，寓意着外柔内刚、以柔克刚的家族品性和人物气节。瞿氏家族耕读起家，为善一方。铁琴铜剑楼，是唯一藏书楼主体与藏书精品保存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藏书楼，藏书以求精、重用著称于世。有琴心，有剑胆，有执着不懈的坚持，瞿氏五代昌隆，家风绵延，百年不散，世代传承书香守望的家族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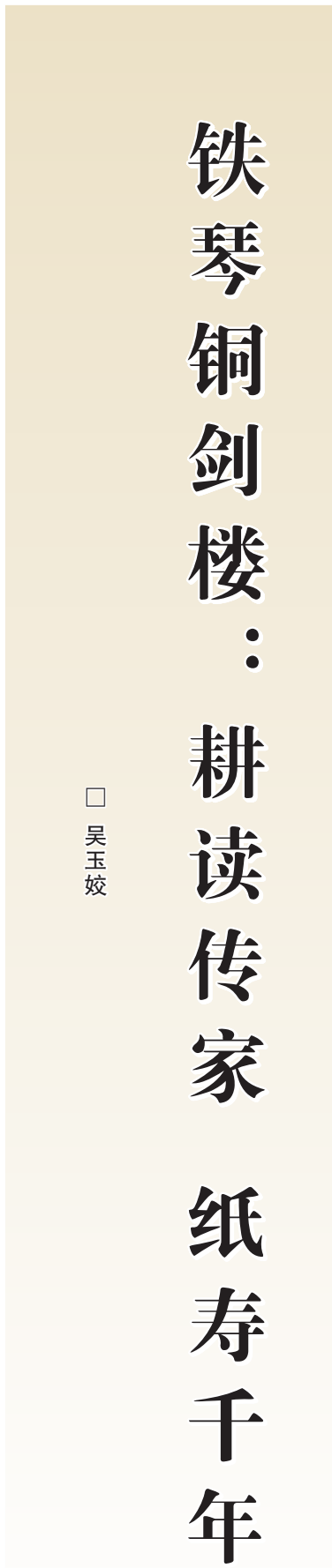
铁琴铜剑楼第一代楼主瞿绍基，生于富裕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瞿绍基藏书室最初名叫“恬裕斋”，以“恬裕”为名，意即让子孙后代享受读书乐趣这份恬静安逸的生活。瞿绍基生性好施与，每遇俭岁，减租平粟；遇到水灾，设厂施粥，毫不吝啬。其父瞿进思好读书，家教甚严，聘请名师在家中授业，绍基自幼受此家风影响和常熟藏书文化熏陶，一生喜好读书、藏书，淡泊名利。瞿绍基“尤嗜书籍，值佳本必购之，藏至十万卷”。其中，宋元本颇多。自此打下藏书绵延五世而不散、奉献国家民族的坚实根基。

第二代楼主瞿镛，子承父业，以藏书为乐，搜寻珍奇善本书籍，不遗余力。瞿氏铁琴铜剑楼之所以能不断发展成为近代四大藏书楼之一，还在于自瞿镛起，一直到瞿凤起，四代人都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学术传统，不懈努力，从事编撰藏书目录的活动。今南京图书馆所藏《恬裕斋藏书记》四卷，即瞿镛所撰藏书目录。后又经瞿秉渊、瞿秉清兄弟及瞿启甲、瞿凤起三代人修订、增补，更名为《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篇幅由四卷扩充到二十四卷，原委井然，为后人做学问做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第三代楼主瞿秉渊、瞿秉清兄弟，遭遇太平天国战事。战乱四年，瞿秉渊、瞿秉清兄弟出入波涛兵刃之中，先后七次转移藏书，以全力护持、保守遗书为东南文献留一线之传。江水滔滔，兄弟二人用小船运书。起伏不定的一叶孤舟，承载着爱书惜书之重。他们以个人之力，不顾危险，备尝磨难，使大量藏书精品得以奇迹般传世，堪称中国藏书史上的壮举。在这个过程中还不忘编撰目录，延请李锡畴、王振声、叶昌炽、王昶蔚、管礼耕等名士增补修订《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战乱平息后，藏书安然返乡。藏书归来，兄弟二人置酒庆贺，并请江阴的画家吴俊画了《虹月归来图》。

第四代楼主瞿启甲，生长于晚清、民国之交。社会动荡、兵荒马乱，尤其面临日寇大举侵华，但瞿启甲不惧战乱、不为利诱、不为势屈、不辱使命，用爱心、勇气和智慧，精心守护着藏书免受损失。清朝末年，两江总督端方看上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以三品京官为诱饵并奖励三十万银元，命第四代楼主瞿启甲呈善本秘籍捐于京师图书馆。瞿启甲聘请抄书高手花了一年多时间，缮写副本呈送京师，宋元善本精品得以保全。启甲临终时留下“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的遗训。

第五代楼主瞿凤起，谨遵父亲的遗命，到解放初期，把书陆陆续续捐公，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捐了15批次。将《玉函经》等宋、元、明善本古籍和那张见证了铁琴铜剑楼变迁的唐代铁琴，一并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另有部分藏书捐至常熟市图书馆等，以得到精心保护和合理利用，完成瞿氏化私为公、百川汇海的历史进程和家族使命。瞿凤起先生在《先父瞿良士先生事略》中所言：“铁琴铜剑楼藏书，肇始于高祖荫棠先生，及余五世，已越一百五六十年，私家收藏，经历之长，仅次于四明范氏天一阁，并得有妥善归宿，可告无罪于先德矣。”



铁琴铜剑楼富有名贵孤本，但并不是藏于密室密不见人。瞿氏藏书历经五世，打破历来私家藏书秘不示人的陈规。书楼中辟有专室，设专人日常管理，供人阅读，为学者们著书立说提供资料，嘉惠学人。读书人前来看书，无论亲疏贫富，一概欢迎，还免费供应茶水膳食，真正把藏书作为天下之公器，起到了公共藏书楼和图书馆的作用。这一开明之举，泽及莘莘学子和众多百姓。其中包括后来成为两朝帝师的翁同龢。面对卷帙浩繁的古籍，翁同龢感到为自己打开的是一座独步海内的宝库，不禁感叹：“瞿氏三世聚书，所收必宋元旧槧，其精者尤在经部。”

铁琴铜剑楼是中国藏书史和图书馆事业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天下好书，当与天下人共之。那些注满了时间重量的一部部善本，穿越历史，与接踵传递的古籍一起，经过五代人悉心呵护，历经岁月的峥嵘磨难，依旧纸寿千年。瞿氏世代殚精竭虑搜书、藏书、护书、献书的历程，乃至于诸多目录解题的编撰刊印，始终贯穿着瞿家世守藏书、藏书报国、服务社会民众的家族精神，体现出瞿氏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传承知识及知识是人类共有财富的认知和奉献精神。瞿绍基之后，代代皆言及“承先志”，彰显出瞿氏家族代代相传、一脉相承的强烈使命感、责任心和虔诚的孝道。这是瞿氏藏书能历五世经百年而不散，最终化私为公、最大限度发挥古籍效用的内在动因，是一种渗透骨髓、流淌在血液中的家族素养和境界，是留给后世不亚于藏书自身学术价值的宝贵精神财富。

